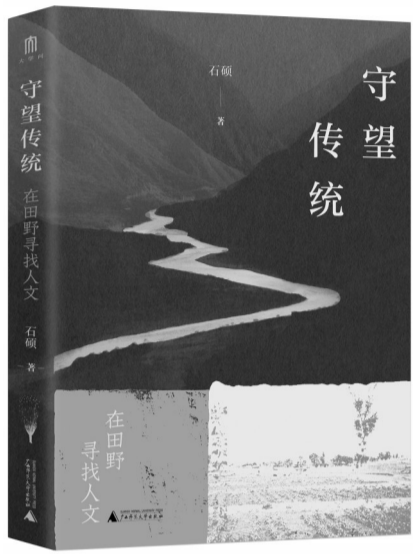


跨越西南大地的文化漫游

何兴权

看点 石硕教授的《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是一部“踏遍山河写成的学术散记”,凝聚其多年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考察的成果。全书以“大地经纬”“文明长河”“生命学问”三大篇章,透过三江源人文地理、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具体个案,在细腻田野行走与散文化的笔触中,探寻历史的流动与人生的鲜活,展现了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传递出学者对传统文化深厚的守护情怀。



在现代学术日益趋向精密化和规范化的今天,石硕的新作《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以一种散文化的笔触,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可能。这部著作凝聚了这位长江学者多年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考察的成果,化解学术著作的枯燥感,将读者带入一场跨越西南大地的文化漫游。

这是一部田野行走之间的学术散记,《守望传统》全书分为“大地经纬”“文明长河”和“生命学问”三篇,结构上遵循了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生命体验的逻辑脉络。在“大地经纬”部分,石硕带领读者走进三江源的人文地理,探询318国道作为“中国大地上的一条美丽项链”的文化意义,解读雪域高原的世界奇观——石渠松格嘛呢石经城的奥秘,以及“茶在汉、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

“文明长河”篇则将目光投向历史纵深,探讨打箭炉这座有“故事”的边城,从民族角度解读杭州,揭示成都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以及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文化路线如何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在“生命学问”部分,作者则关注学术与人生的关系,思考“人类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缅怀前辈学人的为人、为学,甚至探讨“问世间,情为何物?”这样的人生命题。“把学术作为一种信仰,做学问要有人文关怀。”这种理念贯穿全书,使得《守望传统》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学术分析,更是充满温度的人文思考。

作为中国民族史、藏彝走廊、藏族史、汉藏关系等领域的权威学者,石硕在书中通过对藏彝走廊、茶马贸易、康定燕尾式建筑等的探讨,展现了不同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石硕在书中所阐释的“藏彝走廊”研究,其价值在于他引导读者跳出政治疆域和单一民族的框架,用一种历史地理单元和文明通道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片土地。

“走廊”一词本身就充满了动感与交互性。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容器,而是一个开放的通道。石硕指出,这片区域因其独特的南北走向山河相间地貌,在人类大迁徙时代,成了一条天然的“交通走廊”。它不仅不是障碍,反而是连接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枢纽。

书中生动地阐释了“藏彝走廊”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沉积带”。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民族在此迁徙、流动、互动、融合,留下了层层叠叠的文化遗迹。今天我们所见的藏族、彝族、羌族、纳西族、傈僳族等众多民族,他们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都是历史上无数次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果。这使得该地区像一个活态的、巨型“人类博物馆”,保存了无比丰富的历史“地层”信息。

石硕的研究视角从“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转向了“网络—节点”的互动共生。他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并非由某个单一中心向外辐射的结果,而是在无数个“藏彝走廊”这样的互动区域内,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碰撞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宏观理论框架,石硕对“藏彝走廊”的微观实证研究,恰恰为这个宏观理论提供了生动、坚实的注脚,这是其价值的核心所在。

在书中,石硕并未空谈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看见”这种“一体”是如何在“多元”的互动中实现的。他详细论述了“茶马贸易”如何像一条坚韧的经济血脉,将汉地的农业文明(茶)与高原的游牧文明(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技术的交流、情感的沟通 and 共同市场的形成。一条古道,让两个世界不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形成了互补共生的经济共同体。通过考察石渠松

格嘛呢石经城、康定的“燕尾式建筑”等文化现象,揭示了文化因子的跨民族流动。“燕尾式建筑”融合了汉、藏的建筑元素,是民族文化互鉴的实体见证。

“藏彝走廊”的研究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在纸上被定义的,而是在千百年的生计互补、文化交流、婚姻互通、社会共建中活出来的。“多元”是活力的源泉,“一体”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选择。这一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和深厚的学理支撑。“藏彝走廊”的研究天然地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生态学……石硕在书中的论述,自如地游走于各学科之间。他从一个地名、一个传说、一种服饰、一座建筑的样式,就能抽丝剥茧,还原出一段波澜壮阔的迁徙或文化交流史,体现了其宏阔的学术视野。

对于喜欢人文旅行的读者,对于关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者,《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可以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这是本书最动人的地方,石硕的研究对象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智慧、生命态度、文化传承充满敬意与温情。他的学问是“有情”的学问。他研究“走廊”,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为了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读者通过这些文字,不仅能了解中国西南广大地域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感受到一位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及再发现的执着与热情。这些文字见证了石硕在田野行走之间,探寻历史的流动与人生的鲜活的努力,也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互补”的文化内涵的深刻把握。

朱子学与阳明学:东亚儒学接受史比较

华筠

日本学者小岛的《朱子学与阳明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宋明理学的两大高峰,梳理了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核心概念和发展脉络,更从东亚视角展现了儒学思想的传播与演变,为理解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多样表现提供了宝贵视角。

小岛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共分15章节,采用对比分析的方式,系统考察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异同。从宋学诞生到清代考据学,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思想潮流,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勾勒出一幅近世东亚儒学思想的承袭蓝图。

作者不仅关注中国本土的儒学发展,还横向比较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接受史。这种广域的视角让读者能够重新审视近代儒学的继承与发展,理解儒学如何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日本学界在接受朱子学和阳明学时,撇开了具体的“礼”的世界,仅在观

念层面谈论这两种思想。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倾向于用“维护体制的是朱子学,变革运动的是阳明学”这种简化模式来概括幕末维新史。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小岛认为:“江户幕府其实是依靠佛教(寺请制度)在统治民众的,朱子学只是偶尔作为新井白石和松平定信等当政者的理念在发挥作用”。这一观察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日本朱子学的简单认知,揭示了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本土化适应。

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是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它避免了传统哲学史按人头或学派安排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打破传统叙事结构。这种写法凸显了宋明新儒学的哲学性,使读者能够更加聚焦于思想本身的发展与演变。

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真正差异在哪呢?小岛在书中详细分析了两者的核心差异。朱子学强调“性即理”,而阳明学则主张“心即理”。这

一字之差,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朱子学认为理存在于外部世界,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认识和实践;而阳明学则认为心即理,理就在人的内心,因此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在实践层面上,小岛注意到了两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明治时代的能吏大多具备朱子学的素养”,而“实际肩负起日本近代化重任的,其实不是带有阳明学风、气宇宏大的革命家,而是带有朱子学风、踏实冷静的实务家”。这一观察挑战了流行文化中“阳明学推动日本革新”的简单叙事,揭示了朱子学在近代化过程中被忽视的贡献。小岛为读者理解东亚儒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书中详细分析了儒学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环境中的适应与发展。

对“理”这一概念小岛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不仅分析了“理”的学义演变,还考察了二程的功绩、朱熹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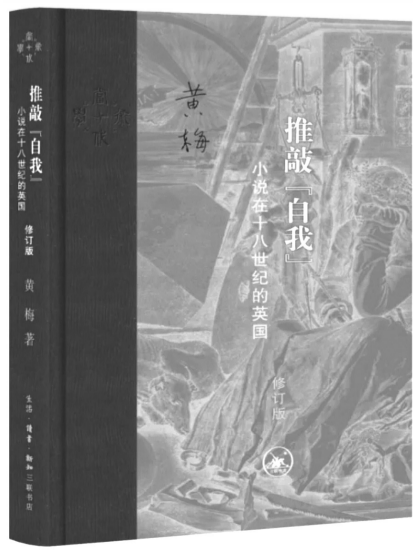
以及“心的”主体性如何在不同学派中得到不同强调。这种概念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丰富了我们对于宋明理学的理解,展现了日本学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独特贡献。

中日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接受根本差异在于“礼”文化的存缺。在中国儒学中,“礼”是连接内圣与外王的桥梁,是道德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时,却剥离了“礼”的具体规范,只吸取了其观念核心。这种差异导致了同样源自中国儒学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在中国和日本发展出了不同的面貌和社会功能。在中国,儒学始终与社会礼仪、政治制度紧密结合,更多地保持了一种道德修养学的特征;而在日本,儒学剥离了具体“礼”的约束,更多地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资源,可以根据需要被灵活解读和运用,成为变革的思想武器。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现代自我塑造

刘梦泽

提示 黄梅教授的《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修订版近日出版,这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力作。本书深入剖析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不仅是文学的演进,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参与者。黄梅论证了小说这一新兴形式通过叙事创新,主动参与了现代“自我”观念的塑造与建构。揭示了小说作品中关于阶级、性别与个人身份的复杂博弈,并巧妙地将其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下进行观照,使遥远的英国文学成为映照当下个体自我意识的一面镜子,引导读者思考“我是谁”这一永恒命题的历史与当下。



黄梅教授的《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以下简称《推敲“自我”》)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更是一张映照当代人自我意识的镜子,让读者在18世纪英国小说的世界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18世纪的英国,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小说悄然兴起,并迅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大众读物。这些小说看似讲述着平凡人物的日常故事,却在不经意间参与了一场思想革命:现代“自我”的发现与建构。

黄梅的《推敲“自我”》通过对这一时期英国小说的细致解读,展示了一个迷人的学术图景:文学不仅反映时代精神,更主动参与价值观念的塑造。

笛福被誉为“英国乃至欧洲写实派的鼻祖”,他的创作突破了过去小说从童话、历史、传奇等题材入手的常规,转而从事个人体验出发。黄梅在书中首先关注了笛福及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荒岛的故事,表面上是一场冒险传奇,本质上却是现代个体自我建构的寓言。鲁滨逊违抗父命、离家出海的行为,体现了个人在建构自我之初摆脱权威和自主选择的精神。黄梅精辟地指出,笛福的自传式长篇小说关注的是“自我”,也就是个人体验。作品中“我”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现,根据“在真实的时间与空间中的行为与感受”进行叙事,创造了一种惊人的真实感。

塞缪尔·理查逊将这种自我探索引向了内心世界。他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突破了传统小说对外在行动的过度关注,转而深入人物的心理空间。理查逊的小说“描述了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精神感情”,展示了年轻女性在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而又深邃的内心世界”。这种对心理真实的追求,使理查逊成为“心理现实

主义”的先驱。

黄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们秉承揭示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互为建构的原则,通过文学创作参与了现实世界的建构。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与《罗克珊娜》是“窥视与劝诫融合的实践”。这些作品既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又承载着道德劝诫的功能,体现了文学创作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复杂关系。黄梅揭示了小说这一形式的独特本质——它通过虚构叙事,反而更有效地参与了现实世界的塑造。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认为文学只是现实反映的简化理解,展现了文学与社会之间辩证互动的关系。

在《推敲“自我”》中,黄梅特别关注了阶级和性别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在她对《帕梅拉》的分析中尤为明显。理查逊的《帕梅拉》不仅仅是一个大权爱上少女的浪漫故事,更是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建构性和可操作性的展现。小说通过贞洁述行实现了中下阶层女性渴望通过婚姻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的“灰姑娘”梦想。黄梅指出,帕梅拉的私人信件到达其目的地——主人毕先生,她的双亲以及社会大众阅读并赞同她在信函中所写的一切。她个人的身份也由一名女仆升格为女主人太太。但同时也正由于全然仰赖于大众的认同许可,帕梅拉的自我无法控制其表现。到小说结束时,她终止原本自然舒爽的“即刻书写”而屈服于她在小说前半部所挑战的阶级制度。

叙事技巧如何塑造自我?黄梅在《推敲“自我”》中展示了出色的文本细读能力,分析了小说形式如何参与自我观念的表述。笛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让主角亲口说出自己的经历,这比旁观者说出别人的经历更有说服力,也更能体现“真实

性”。当“我”说出自己的经历时,读者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强烈的信任。理查逊则发展了书信体形式,使其成为“最能体现细腻感情的叙述方法”。以“你”和“你们”作为故事的开始,主角的注意力由普通的观众转移到了她的家长身上,使得阅读的观众脱离了自身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窃听他人隐私信息的人。

《推敲“自我”》修订版的最大亮点,在于黄梅自然融入了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关怀并在中国语境中思考英国文学。她通过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与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化对话。研究18世纪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等背景下的英国社会“自我”的变迁与修正,有助于思考当下人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黄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展开叙述,概念后面总是有细致精到的文本阅读与分析。这种扎实的学风,使她的著作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可读性。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作品时,提出了自我塑造理论,强调“是我自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黄梅为我们展示了文学文本如何成为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如何呈现社会及文学文本世界的社会化。这种研究方法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新历史主义者的“自我塑造”理论有着对话关系。《推敲“自我”》的学术价值不仅限于文学研究领域,更拓展到了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范畴。黄梅不仅关注个体如何塑造自身,更关注自我塑造如何受到社会、宗教、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展示了自我形成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通过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精湛解读,展示了文学如何成为自我观念形成的重要媒介。



茶馆展开的社会风俗画

李海卉

茶馆从来都不只是饮茶的场所,一盏清茶,几碟茶点,方寸空间里氤氲的不仅是茶香,更是一个时代的烟火气息。老舍的《茶馆》通过文学笔法,将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浓缩在一个茶馆中。剧中70多个人物,50个有姓名或绰号,贩夫走卒与达官贵人同处一室,家长里短与社会变迁交织碰撞,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图景。老舍人说起茶馆,总带着几分复杂的情感。秋原在《茶馆之殇》中细数了北京茶馆三百年的兴衰浮沉。

成都的茶馆则另有一番韵味。历史学者王笛用20年光阴,写就《茶馆》两卷(《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将成都茶馆的日常琐碎写成一部城市公共生活的百年史诗。成都人爱泡茶馆,早就流传着“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的趣谈。成都茶馆的茶具别具一格,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称为“盖碗茶”。桌椅也颇具地方特色,小木桌配以有扶手的竹椅,舒适而惬意。

堂信是茶馆的灵魂人物。他们一手提紫砂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未及桌前便能将茶碗准确搬到每位顾客面前的茶船中。技艺之娴熟,动作之优雅,堪称一门艺术。有民谣这样描述堂信的生活:“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色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这些堂信不仅是服务者,更是茶馆这个小社会的维系者。

茶馆里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评书、相声、竹琴、扬琴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王笛发现,在成都茶馆,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这些听书人不经意间承担了教化功能,将忠、孝、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念传递给市井百姓。

清代民间纠纷在告到官府前,往往先在茶馆进行“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成了微型的司法仲裁场所,乡绅老坐在茶馆里,听着双方的陈述,品着香茗,慢慢梳理是非曲直。一壶茶尽,恩怨也常随之化解。这种民间调解机制,展现了传统社会自我治理的智慧。时光流转,茶馆的功能不断延展,成了行会聚集地、娱乐场所、简易饭馆,甚至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市井传闻、商业讯息、时政新闻在这里交汇传播。茶客们边品茗边交谈,不经意间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信息交换。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茶馆承担了社交平台的功能,连接着个体与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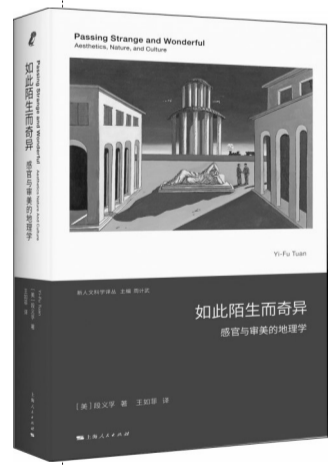
秋原笔下,清朝灭亡后,茶馆转向服务普通大众,茶馆里的文化项目从说书变成接地气的相声表演。这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坚持,折射出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扎根之深。

回望茶馆的变迁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兴衰,更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演变。从老舍剧本《茶馆》里的人生百态,到王笛研究的成都茶馆的日常琐碎,再到城市空间的探索,茶馆始终是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成都人有句爱说的口头禅:“到口子上去吹三花!”意思是“到街口茶馆去喝三级花茶”。这句方言里藏着一种城市生活的归属感。茶馆文化滋养着城市公共生活,一壶茶里,泡的是茶叶,沉淀的是历史,品味的是生活。

一碗清茶,半部社会史。从老舍笔下的北京裕泰茶馆到王笛研究的成都茶铺,方寸空间里承载的不仅是茶香笑语,更是城市生活的微观宇宙。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价值,在当下数字化的时代,尤显珍贵。

荐书

如此奇异而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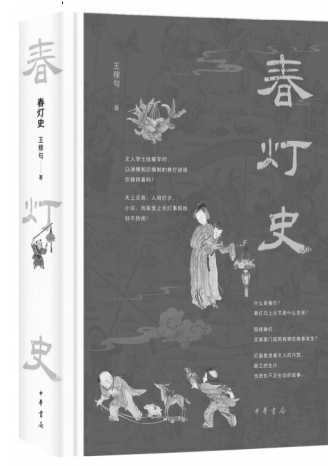
《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集中探讨审美的一本著作,生动展示了感觉与美在我们的个人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段义孚试图建立一种积极的眼光,尽管人类有种种恶行,但文化的要旨总是在于使人抵达更好之处。本书是对周遭世界、个体经验及人类创造的礼赞。



《园境:明代十一佳园》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山水为蓝本,呈现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特征。明代园林更是融会两宋精秀美的特点,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丽芳教授挖掘明代文人运用独特的自然建筑学分析法,用图文并茂地“还原”出11座明代佳园。



《春灯史》
中华书局

上元节的风俗内容十分丰富,张挂春灯是十余年来传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民俗活动,寄寓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书分《灯略》《灯市》《灯苑》《灯品》《灯画》《灯谜》《灯戏》《灯俗》《灯事》九篇,介绍了春灯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千百年来自南北各地的绚丽场景,读者通过春灯了解民俗的变迁和历史的细节。